

# 论东欧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

邵 帅

**摘 要：**随着20世纪的语言转向，东欧马克思主义者日益重视语言问题，产生了东欧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东欧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继承经典马克思主义，关注人的现实性、历史性、社会性，回答了日常生活中的语言问题。而以日常言语行为理论为视野，可以发现东欧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其分别从语言的目的、内容、效用三个方面发展出交往语言理论、实践语言理论、社会语言理论，丰富并发展了“现实的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改变世界”三个经典命题的内涵。

**关键词：**东欧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实践存在

## On the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Eastern Europe

Shao Shuai

**Abstract:**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rxism in Eastern Europe increasingly valued language issues, resulting in the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Eastern Europe. Inherited from classical Marxism, the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Eastern Europe focuses on the reality, historicity, and sociality of human beings and answers everyday language questions. Moreo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eryday speech act theory, we find that the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Eastern Europe is systematic and integral in

---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22）阶段性成果。

nature. In terms of language purpose, content and utility, it has developed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heory, practical language theory and social language theory, respectively, enriching and expanding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three classic propositions of “person in reality”, “practical materialist” and “changing the world”.

**Keywords:** Eastern European Marxism,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ractical existence

**DOI:** 10.13760/b.cnki.sam.202202003

20 世纪的语言转向开启了哲学史的新阶段, 语言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的焦点。语言转向, 不仅带来了以弗雷格、罗素、(前期) 维特根斯坦等为代表的分析哲学, 还产生了以(后期) 维特根斯坦、乔姆斯基、奥斯汀、塞尔等为代表的语言哲学。<sup>①</sup> 不仅如此, 语言转向也引起欧陆哲学的关注, 如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也将现象学、存在论、解释学聚焦到语言问题上, 以不同的视角考察语言问题, 提出“语言是存在之家”(海德格尔, 2014, p. 369) 等命题。但在此过程中, 经典马克思主义由于仅零星论述语言问题, 而非对语言的专门研究, 所以通常被认为是“失语”即语言问题缺席的(蓝江, 2013, p. 38)。但通过西方学者的阐释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一支——西方马克思主义融入了语言转向, 在语言哲学的维度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将语言分为“上帝的语言”“人类的语言”“事物的语言”的本雅明, 从共时性与历时性辩证统一的角度出发批判结构主义的詹姆逊, 把语言看作交往的媒介来建构交往理论的哈贝马斯, 以及建立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柯亨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共同推动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语言转向(俞吾金, 2003, pp. 41-45)。

然而,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处于资本主义国家中,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联系不够紧密, 带有一定的唯心主义与乌托邦色彩, 有其局限性。与之不同, 受社会主义与苏联理论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支——东欧马克思主义对语言问题的思考, 带有东欧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与人道主义关切, 以独特的东欧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波兰, 沙夫、科拉科夫斯基、克拉耶乌斯基以及查科夫斯基(Z. Cackowski) 等哲学家提出并阐发了

---

<sup>①</sup> 关于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的关系, 详见蔡曙山 2006 年论文《再论哲学的语言转向及其意义——兼论从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分析语言符号学思想 (Skolimowski, 1965, pp. 235 - 258); 在捷克斯洛伐克, 穆卡若夫斯基综合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提出功能结构主义思想, 而施陶尔则提出“人化”的马克思主义语言符号学思想; 在南斯拉夫, 以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实践派从存在论的实践 (praxis) 范畴出发, 构建起辩证意义理论; 在匈牙利, 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关注日常生活, 探寻话语交往与话语文化中的语言问题。

东欧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 吸收西方哲学和语言学等理论, 分别围绕语义、语言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实践、语言交往等主题, 构建起丰富、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 为应对英美经验派与欧陆先验派之争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新路径 (袁文彬, 2007, p. 11)。东欧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亟待系统的理论考察。具体而言, 东欧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凸显并深化对日常生活的关注,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理论” (关巍, 2019, p. 37), 聚焦时刻发生的日常言语行为, 分别从语言目的、语言内容、语言效用三个角度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理论命题: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马克思, 恩格斯, 1965, p. 334); 共产主义者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 (马克思, 恩格斯, 1960, p. 48);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 恩格斯, 1960, p. 6)。东欧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这一特点既在总体上契合日常生活理论, 又在具体上符合这三个语言角度, 因而呼唤以奥斯汀日常言语行为理论为视野, 以从语言的目的即“以言行事行为” (illocutionary acts)、内容即“以言表意行为” (locutionary acts)、效用即“以言取效行为” (perlocutionary acts) (陈嘉映, 2003, p. 240) 出发, 厘清其特征并阐明新路径何以可能的问题。

## 一、交往语言理论: 语言目的与现实交往

经典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唯物史观以“现实的人”为基本立场和出发点, 不仅从哲学上批判了德国古典哲学与机械唯物主义对人的唯心化、抽象化、固化的理解, 而且深入当时的政治经济现实, 论证人的现实性。在此基础上, 东欧马克思主义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深化“现实的 - 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人, 考察“现实的”人的语言内涵, 即考察“现实的 - 语言交往中的”人。人的现实性不仅体现在其作为主体参与的政治经济活动中, 更体现在主体间的语言交往活动中, 由此, “现实”概念被赋予了语言的以言行事

## □ 符号与传媒 (25)

(illocutionary) 意蕴。

以言行事行为,在奥斯汀看来,表现为如“通知、命令、警告、保证等具有一定(传统约定)力量的话语”(Austin, 1962, p. 108)。这种“约定力量”(conventional force)显露出语言交往的维度。“许多以言行事行为,按照约定传统,会引起要么单向要么双向的回应或后续结果”(p. 116),即话语不仅有受众,而且要求受众做出反应,形成互动关系。互动意味着主体间性,以言行事行为“依赖说话者的交际意图,这种意图必须在语境中推断”(Stiles, 1981, 227),因此交往目的与语言环境至关重要。围绕目的和语境,东欧马克思主义者从交往维度开启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现实的语言交往活动,建立东欧马克思主义的交往语言理论。

波兰马克思主义者沙夫深入探讨“两个关于语言理论的重大问题”,即“语言的思维和实在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的思维和交际过程之间的关系”(沙夫, 1979, p. 318)。在语义学的基础上,通过回答这两个问题,沙夫勾连起实在-思维-语言-交际四维整体,以交际为目的,提出了以交往符号学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

沙夫所做的第一步,便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回答实在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因为语言与思维是一个整体,而语言又是“在人类经验的过程中形成的,它本身是一个经验的事实,而不是一种任意约定的产物”,所以“思想-语言”就是对“实在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实在本身的发展”以及人对“实在的理解的发展”推动了“思想-语言的发展”。(沙夫, 1979, p. 328)人类在经验活动中,首先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实在,实在受到人的意识的打量。“意识[*das Bewuß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ßte Sein*]”(马克思,恩格斯,1960, p. 29),它是加了定语、受到限定的存在;意识就是对存在的反映,意识的思维活动也就反映了存在着的实在。如此,便以唯物主义的方式,将实在与思维联系起来。

同样,思维和语言也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语词指号用来在主观认识反映客观实在的过程中表述思想”(沙夫, 1979, p. 312),语言作为人在实践中演化出的工具,可以将人内在的主观感受外化。只要是生活着的人,就无法脱离语言,即使无法以有声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对实在的认识,也能以文字、符号等其他语言形式来表达。人总是在语言中存在,语言是人在认识活动中用于表达思想的工具与媒介,思维与语言便由于认识活动的需要而勾连在一起。

“实在-思维-语言”的这种勾连最终导向了交际,交际是最终的目的。

表达与接收是一对范畴，表达离不开接收，需要一个他者，若没有作为接收者的他者，表达便始终是内在的主观活动，与不表达无异。如果缺乏他者，那么主体自身的思想只在表达形式上有差别——心理活动与生理活动、有声与无声<sup>①</sup>的差别。人用语言表达思想，就是为了服务于主体间交往。无论是进行直接的交往活动，还是通过表达对实在的认识、交流思想而间接地实现交往活动，语言始终内在地具有以言行事力量，或者说以言行事行为是“在说话之中”<sup>②</sup>的（Austin, 1962, p. 99），人将思想付诸话语有着交往的目的。语言与交际环节便如此衔接起来。

“对于语言的了解，是交际的基础”（沙夫，1979，p. 348），而了解语言便是了解思维（意识），也就是了解实在。通过构建实在 - 思维 - 语言 - 交际的整体性，沙夫回答了两大重要语言哲学问题，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打通物质、单数的意识、复数的意识之间的通道，由实在、思想过渡到交际，构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交往符号学理论<sup>③</sup>，从语义理论上阐发了“现实的人”当中的语言交往维度。

与沙夫的语义学切入点不同，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赫勒从语用角度入手，不仅将“文化理论融入符号学机制”，提出话语文化概念<sup>④</sup>，更从现实出发，在现代性的语境下，直面话语文化背后的语言哲学问题，回到在话语文化中更为基础性的语言交往问题。赫勒的语言交往理论，以1984年出版的《日常生活》为主体，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出版的道德哲学三部曲与现代性三部曲为后继而建构。

在《日常生活》中，赫勒并非形而上学式地探讨语言问题，而是将之归入“自在的”类本质活动中，在主导“物质操作活动”的工具、“控制着我们的态度和社会姿态”的习惯、作为“思维的媒介”的语言（赫勒，2010，p. 119）三者构成的语境整体中展开其语言交往理论。交往并非也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交往，因为所有人只要参与通过交流达到以言行事目的的语言互动，

① 虽然还有文字语言、手势语言等，但此处仅以有声语言为代表而不一一列举，并且这种代表也符合沙夫“非有声语言仅仅是有声语言的一种翻译”之意。参见沙夫《语义学引论》（1979，p. 335）。

② “‘Illocutionary’ act, i. e. performance of an act *in* saying something”，奥斯汀在这里用“in”指以言行事行为，突出了其“在……之中”的结构。

③ 关于沙夫的交往符号学理论，参见傅其林《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交往符号学思想》（2015）。

④ 有关话语文化参见傅其林《论东欧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核心命题》（2020）。

就统统置身于交往行动之中。<sup>①</sup>这就要求以整体性的视角，在现实的世界当中，看到交往的语言环境，因此赫勒以如此整体性的眼光考察语言本身，将其置于联系之中。

首先，语言与工作即使用工具的活动是密不可分的。“语言的功能之一是指导工具（对象）的使用，并且协助把这一运用转变为实践。”（赫勒，2010，p. 120）对于工作、使用工具而言，语言让工具的使用方式成为可知的。通过语言的描述，工具的使用方式不再局限于单个人的心灵之内，而是得以表达，进而可以在传递、交谈中为他人所吸收，不仅有着教育、指导他人使用工具、进行实践的作用，而且能够起到“命令”“请求”“禁止”的作用，辅助“指导工具的使用”，让工作进行顺利。

与语言和工作的关系不同，“语言总是语言习惯”（赫勒，2010，p. 120），如果说语言和工作的关系是一种共时性的关系，那么语言与习惯就是历时性的关系。之所以将语言习惯等同于“语言”，而非“语言本身”，是基于赫勒独特的视野。在她看来，不存在语言本身（itself）。赫勒的语言观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现实的人”并吸取了（后期）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维特根斯坦，2003，p. 47）的思想，认为现实的语言并不是以一个元语言概念为本质、主线构成的，而是在交往中由各种语言交互组 - 成的，并且，这种组 - 成具有现实丰富性、交往生成性。语言是历史地发展与演变的，所以曾经的语言习惯就构成了当下我们所使用的语言。

工作要求语言交往，而习惯则是语言交往的产物，工具 - 语言 - 习惯的整体性就如此建构起来，语言所处的整体环境就得到厘清。而且，赫勒认为，在这三者的整体关系中，语言占据了优先地位，没有语言就没有另外二者，“语言指导着以其他形式对象化所进行的思维”（赫勒，2010，p. 123）。基于语言的这种现实整体性，赫勒进一步阐发语言交往的机制，点明了“习惯和社会方式在交谈中”的作用，即语言交往会受到礼貌或避免歧义等目的的影响（p. 140），这种影响在道德与现代性论述中得到进一步展开。

在赫勒看来，语言交往不单是通常所理解的信息传输，这一目的背后，还有道德的目的，即交往的礼貌。例如，比起说“不准”的命令式话语，说“你不应该再这样做了”则在传达“不”的信息以外，还有“道德建议”

---

<sup>①</sup> “Thus I count as communicative action those linguistically mediated interactions in which all participants pursue illocutionary aims, and only illocutionary aims, with their mediating acts of communication.” (Habermas, 1984, p. 295)

(赫勒, 2015a, p. 145), 这就从含有等级差异的命令转变成平等的对话。正如赫勒所说, “存在的选择的模式本质上是对话式的, 而且它是建立在不只是一个而是很多人已经选择他们自己作为正当的人以及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是好的这一假设基础上” (赫勒, 2015b, p. 36), 在含有道德意味的话语交往之后, 更为根本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即人都是“好的”与“正当的”, 因为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开展真正的对话——否则就只是一种“命令”, 后者没有对话所具有的交互式言语过程, 话语是单向的——基于伦理的平等才能蕴涵 (entail) 道德目的, 从而赋予交往以道德意味, 所以说“这种道德对话本身就是伦理的展现” (p. 36)。

在现代性理论三部曲中, 赫勒从现代性话语背景出发, 在道德对话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语言进行了规定。她说“语言是家”, “逻各斯 (语言) 加强防御全部的非理性的恐惧”<sup>①</sup> (赫勒, 2015c, p. 133)。在现代社会, 人际交往的地域范围扩大, 跨地域的人际交往首先面对的就是语言问题, 因为语言是媒介, 无法理解语言就无法进行语言交往。<sup>②</sup> 当人身处异国他乡之时, 虽然身体离开了家, 但心灵却仍在语言之家, 依然以母语的方式道说 (logos) 着, 母语以家的方式庇护着离家的人, 消除恐惧等非理性情感, 从而能够在理性 (logos) 的状态中思考, 遵循“语言游戏”<sup>③</sup> 的规则, 进行正常的语言 (logos) 交往活动。

通过构建“工具-语言-习惯”的整体, 赫勒不仅表明语言是在工具使用中的语言, 是作为习惯的语言, 而且以此为地基进入实践理性层面, 发现语言在交往中除了作为传播媒介, 还作为道德表达与理性之家。“我的思想、观点、情感愈多地进入交流, 我对它必须承担的责任就愈大。” (赫勒, 2012, p. 155) 人越在现实的交流而非抽象的思想中, 就越肩负起这种“责任”, 即要求更高的实践理性能力, 不仅在真实性层面对交往话语负责, 而且在实践-道德层面与理性-规范层面负责。

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那么东欧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现实交往的科学。以沙夫、赫勒为代表的东欧马克思主义者着眼人的现实性, 发展了“现实的人”的语

① 赫勒用“逻各斯”意在强调“逻各斯-语言-理性的统一性”。

② 这里可能会有反对的声音, 说不理解语言也能通过手势、肢体沟通, 但这种手势、肢体也属于广义的语言符号, 具有以言行事力量。

③ 关于语言游戏, 有如“社会科学, 这些最卓越的现代语言游戏”等论述, 参见赫勒《现代性能够幸存吗?》(2012, p. 18)。

言哲学，前者将马克思唯物主义与波兰语义学传统结合，注重语言交往中语义的理解与真实性；后者则深入具体的话语交往现实，关注语言的具体使用，以整体性的眼光阐明语言使用的道德性与规范性。东欧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从“以言行事”力量入手，构建交往语言理论，在“真”与“善”的层面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的人”的命题——在这里，“现实的人”是在现实交往中的人。

## 二、实践语言理论：语言内容与实践表达

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首要观点，同样由东欧马克思主义者阐发出语言意蕴。南斯拉夫实践派将实践（praxis）作为存在论概念，而非传统的认识论实践（practice）（马尔科维奇，2010，p. 19），构建起实践存在论，进而结合语言哲学，建立以实践存在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并且，这种语言不是静置的、现成的，而是随人的实践-存在一同生成的，语言有自身的历史，是实践-生活经验的、历史性的语言。因此，语言及其历史离不开人的实践-存在及其历史，语言属于实践-存在，具有历史性、生成性。在这种意义上，东欧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研究，特别是南斯拉夫实践派，聚焦人的历史性，在具体的历史中，回到历史的语言本身，探寻语言的历史内容及其与实践的关系，赋予实践以语言的以言表意（locutionary）意蕴。

以言表意行为，指说出具有一定意义和指称的句子。（Austin, 1962, p. 108）以言表意行为构成了其他语言行为的基础，首先需要“言”，才能进一步表达“言外”之意和“言后”效果。在奥斯汀处，“每个以言行事行为都是以言表意行为，反之则不然”，以言表意行为主要是对命题的表达，在理解命题的基础上，“以言表意行为才构成以言行事行为”。（Kissine, 2008, p. 1195）以言表意通过对命题的言说与理解而成为言语行为的基础，命题是其中的核心内容，理解命题是言语行为的关键。东欧马克思主义者以实践唯物主义的视角，关注语言命题本身，将命题视为实践-存在的表现，从实践的向度构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考察历史的语言实践活动，构筑东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语言理论。

以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实践派将人视为“实践的存在”，认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即一种能从事自由的创造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改造世界、实现其特殊的潜能、满足其他人的需要的存在”（马尔科维奇，2010，p. 18）。从这个命题出发，实践派哲学家们开始了对语言哲学问

题的探讨。

马尔科维奇认为，卢卡奇看到但仅仅看到各种现象中“现实的本质”都有“主观的因素”，这部分地“是意识存在——作为活动者的人——的参与使然”（马尔科维奇，2010，p. 16）。卢卡奇对人的强调停留在“意识存在”，认为是意识让现象的本质具有主观因素。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而马尔科维奇则坚持马克思唯物主义，超越卢卡奇，看到一切本质中的主观因素并不仅停留于“意识”，“意识”不是唯一的，因为单纯的“意识”始终是内在的，没有获得现实形态，这种内在的、属于个体的意识无法化形，无法对现实产生作用、推动现实发展，只是由于其意向性结构而与现象保持一种静态的关系。

比卢卡奇更进一步，马尔科维奇将人与现象置于历史、动态的关系中，从意识回到人的存在问题。比“意识存在”更为根本的，是人的“实践的存在”，因为人首先需要实践地存在（sein），才能产生意识问题，所以更源始地说，是实践-存在决定了主观因素与“现实的本质”。实践存在“是在人类实践的认识中永恒地、客观地被赋予和设定的”，不仅如此，它还“通过人类的语言和人类的概念结构得到了表述”（马尔科维奇，2010，p. 16）。实践既决定了“本质”的存在（sein），又让“本质”在实践中表达，即由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形成的习惯”所产生的“语言概念”——作为“实践经验的结晶”的语言，也即语言的内容来表达。（p. 16）这样一来，不仅实现了对卢卡奇的突破，将对“本质”的探寻深入到实践-存在中，而且通过这种“本质”勾连起了实践-语言，回答了语言是什么、语言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在马尔科维奇看来，语言是实践历史经验的结晶。因为人总是实践的存在，一切关于人的大厦都奠基于实践，人的认识也是如此。对现象的认识，不是意识对现象的主客二分式打量，而是在历史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sup>①</sup> 在实践-存在中，人生成了认识，生成了对“现实的本质”的认识，并且由于实践是不断进行、历史发展的，所以认识也是具有历史性的，是不断变化的，这种认识已然是实践的历史-结晶，认识又进一步通过言说表达出来，语言便是对实践的加工与提炼，实践凝结在语言之中（in）。所以马尔科维奇说“语言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经验的结晶”，是历史地积淀的，话语的内容并

<sup>①</sup> 实践作为存在论概念，并非在认识论意义上决定认识，毋宁说认识是在实践之中生成的，不是一般地被决定的。

不仅仅是意识的内容，而更为本质地是实践的内容，是从实践中来的。而且，新的语言与语言概念也只是“当它们实现了某种实践目的时才能被创造”（马尔科维奇，2010，p. 16），这就更加阐明了语言内容不仅是实践以因果论的方式决定，而且也以目的论的方式决定——历史的实践有历史的目的，历史的语言也就为历史目的所决定。

在马尔科维奇的基础上，久罗·苏森基奇从语言对实践的作用及二者的辩证关系来回答实践与语言的问题。在苏森基奇看来，语言的以言表意内容，即“语词、概念、假设、理论”不是用来“描述和解释”现状的，而是用来提供“方向”，指明“如何才能”“应该怎样”“必须怎样”行动的。（马尔科维奇，2010，p. 190）

苏森基奇同样认为，语言不应仅驻足于意识层面，而应从意识-描述和解释深入到实践-存在层面，语言命题应回归人的实践存在，语言的内容应与实践相勾连。语言本身的内容并不停留于话语的意义，不仅仅是思想的表达，它在“实践-思想/认识-语言”的结构<sup>①</sup>中穿过了思想/认识，进入实践，对实践产生影响，指导实践的方向，为人的实践行为提供方向指引。且这种指引是历史性的，因为“应该怎样”中就蕴涵了“应然性”，具有了历史发展的向度。所以苏森基奇说，语言的内容不仅仅是标签，“而且也指明了人们应该怎样使自身适应于”现实，并且那些在语言中表达出来的“法律准则、道德律令、意识形态”和“宗教戒律”都对起着“支撑和指导的作用”。（马尔科维奇，2010，p. 190）同时，语言的内容远不止于以这些理性的形式影响人的实践存在，它还能“唤起”人的内在非理性力量，即“惊讶、强烈的感情”（p. 194），从而作用于人的实践-存在。

具体而言，一方面，在苏森基奇看来，语言呈现出法律、道德令等内容，通过这种理性-逻辑命题的形式将理性的力量传给人，让语言以其特有的方式为实践附上理性的色彩，从第三者如立法者、统治者、主教等的角度为实践的存在提供理性-逻辑的“支撑”与“指导”；另一方面，苏森基奇看到语言中与命题一道而来的第二股力量，它超越了“含义与指称”，比如音调所呈现出的情感，以一种“唤起”的方式，将非理性的情感从人心中唤醒——这与理性的支撑和指导不同，这种情感不是由律令-逻辑论证的，而是在人自身之内，话语内容只是作为“思想的助产士”将之唤醒。因此，苏

---

<sup>①</sup> “实践-思想/认识-语言”即马尔科维奇所构建的结构，将语言看作对实践的二次提炼，语言是“实践经验的结晶”。

森基奇将前者称为“支撑和指导作用”，将后者称为“唤起”作用，并且只有在“人们理解了”“语词”的基础上，语言命题内容或者情感内容即“我所说的这一切才有意义”（马尔科维奇，2010，p. 195），语言命题就基于理解以这两种方式影响着人的实践-存在。

苏森基奇不仅强调语言对实践的作用，也关注二者的辩证关系，看到实践对语言的存在论意义。话语内容要想对实践产生影响，首先要求的不仅是理解内容本身，即一个个的语言单位，而且还要求理解内容所关涉的人的实践存在，否则话语就无法产生意义或者可能产生歧义。如苏森基奇所说，对话语内容理解的失败，大致有“别人不理解我的语言”“我的语词中有一种不同的或不一般的经验”“我用一种他人不习惯的特殊模式组织我的语词”“同样的语词对他人具有不同的意义”（马尔科维奇，2010，p. 195）四种理由。这四种理由构成了一个连环，在实践存在论上导致对内容理解的失败。

最直接地，不理解说话者的实践-存在，也就无法理解“我的语言”内容本身及其中指涉的“不一般的经验”。因为语言既是经验的表达与反映，又随经验一道生成，二者息息相关，所以无法理解内容-能指（signifier），就无法达至经验-所指（signified）。更进一步，也就无法理解言语行为中组织语言的“特殊模式”，因为组织语言的模式总是受到实践存在的影响，如一个“习惯”以主-谓-宾顺序说话的人无法马上理解以主-宾-谓顺序构成的语言；又如“习惯”一个发音的人无法明白另一语种同样的发音，这造成同样的词语产生“不同的意义”。从单个的“我的语言”开始，四个环节依次呈现，最终导致从整体上对语言的不理解。

并且，对于实践-存在的意义，苏森基奇特别强调，语言的内容与意义不仅在于“语序”，也在于“社会秩序和心理秩序的功能”，即“句子的结构”与“社会的结构”，内容差异是与实践的“分工和功能的专业化”密切相关的。（马尔科维奇，2010，pp. 195 - 196）这进一步阐释了实践存在的“经验”如何影响语言的组织“模式”，进而让内容无法被理解，而这种内容上的无法理解就又回到实践上，即让实践无法得到理性的“支撑和指导”，并缺乏被“唤起”的非理性感情。

以实践的存在论眼光，南斯拉夫实践派在回答语言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时，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赋予了新的内涵。他们关注人的历史性，推动形成了实践的语言哲学。马尔科维奇从实践的存在经验入手，阐明语言是“实践经验的结晶”，语言在实践存在活动中具有历史的性质，由历史的实践-存在决定；苏森基奇从理性与非理性两方面阐明语言内容对实践存在的影响，

并由此深入，厘清在实践存在的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社会结构对语言内容更为根本的决定性作用，点明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南斯拉夫实践派为代表的东欧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深入语言的实践 - 存在论基础与历史性特质，关注“以言表意”行为本身，建立实践语言理论，彰显了“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历史 - 语言维度。

### 三、社会语言理论：语言效用与改变世界

“改变世界”的命题贯穿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马克思主义实践，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演化发展。“改变世界”的命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主要指劳动实践、阶级斗争、革命等内容，而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在 20 世纪则注意到语言对人的影响，及语言对世界产生的实际效用。改变世界的不仅是暴力革命、劳动实践，更是人的社会语言。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关注语言“改变世界”的作用，即语言达到的效果，为此命题增添了以言取效 (perlocutionary) 意蕴。

以言取效，在奥斯汀看来，一方面意味着我们通过 (by) 说话来实现、达成效果。(Austin, 1962, p. 108) 在该以言取效行为界定中，“通过”一词表明了语言的中介作用，语言成为人达成实际效果的途径，属于改变世界的手段之一；另一方面，奥斯汀强调语言常会对人产生某些影响 (p. 101)，关注言语的最终实现，即在受众身上所引起的具体反应，且这种反应不是在语言本身之内 (in)，而是借由它得以实现的在外的反应<sup>①</sup>。基于这两方面，东欧马克思主义者既考察作为中介的语言是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又探析语言在社会中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把握住以言取效行为的双重内核，从社会的角度阐发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建筑东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语言理论。

斯洛文尼亚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齐泽克，从弗洛伊德、拉康所建立的精神分析理论出发，重审人改变世界的状况。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他发现了语言在意识形态改变世界过程中的重要中介作用，即正是通过作用于人的欲望，意识形态充分发挥了语言的以言取效力量，实现了欲成的效果。

在齐泽克看来，意识形态“这个崇高躯体的假想性存在”“依赖符号秩

---

<sup>①</sup> 哈贝马斯在奥斯汀的基础上，用“以语言为中介的策略行为”表示“参与者想用他的言语行为去产生效果”，对以言取效进行了进一步的界定。(Habermas, 1984, p. 295)

序”，即“总是由某个符号性权威的担保来维持的”。（齐泽克，2017，p. 13）意识形态若没有语言的“符号秩序”，便永远停留于假想之中，即永远作为观念的东西而无法得到现实化表达；只有当它被符号化，在语言中展现自身时，它才能获得现实的形态，为左右现实世界奠基。所以齐泽克说，作为符号，语言维系着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影响现实、改变世界所依靠的核心力量。这种依靠语言而现实化的意识形态，已然脱离了纯粹的社会意识范畴，被视为“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张一兵，2012，p. 192），而且，这种作为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有可能“以特殊冒充普遍，即为特殊权力利益服务，却试图说服人们这是普遍真理”（p. 193）。意识形态既通过语言将自己符号化成为社会存在，获得现实表现，又通过语言的手段，即“说-服”，来影响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改变人的思想，在语言的现实符号表达基础上，正式开启“改变世界”之路。

这种通过语言“说-服”而来的“改变”，是以间接与直接两种方式做出以言取效行为的。意识形态话语改变世界之间接性，在于意识形态中的主观原则以隐蔽的方式起作用，侧重于“说-服”中的“说”。意识形态的话语内容在进行“社会控制”，或与“权力”“剥削”发生关系时，就会以“固有的、非透明的方式起作用”，即“控制关系合法化”的关键就在于意识形态的“隐藏状态”。（齐泽克，2002，p. 10）意识形态话语所服务的主观原则，通过语言将自己包裹起来，以客观、公正、理性的方式出现在话语中，将自身普遍化。

基于此，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剖析，齐泽克进一步解释道，“可口可乐”这一意象暗含了“对美国的某种意识形态体验-愿景”，这是因为美国与“可口可乐”这个语言的能指联结起来，可口可乐这一语言所指的一切魅力同时成为美国这一能指的魅力。（齐泽克，2017，p. 135）意识形态通过语言的外壳，将自身与特定的话语能指等同，并越俎代庖，将原本话语的所指据为己有。人们还在使用原本的话语时，就已经受到意识形态的裹挟，不知不觉欲求着意识形态所勾勒的美好图景。意识形态以语言为中介，通过（by）语言实现意识形态所欲求的效果，即通过改变人的欲望来改变人的行为，从“欲”到“行”以“改变世界”。

相比间接方式的隐蔽性，“律令”这种语言形式更为直接、明显，强调“说-服”中的“服”。齐泽克认为，语言律令之所以有效，人之所以“必须服从律令”，是因为律令本身的“构成性”，这显示出“律令权威的恶性循环”。（齐泽克，2017，p. 38）在语言的命令形式中，意识形态直接向人发号

## □ 符号与传媒 (25)

施令，不再以能指的把戏骗过理性的反思，而是直接将效果强加于人。如果说在间接方式中语言的“说”在暗中导向了“服”，“说”为“服”服务，那么在这里，“说-服”直接变成了“服”，即使人服从，直接产生“服”的效果，规定并构成人的欲望，而“说”即能指本身已经不再重要。

就这样，齐泽克通过勾连意识形态-语言-欲望-世界，以意识形态的语言符号化为基础，在批判意识形态将世界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阐明了语言如何影响人的欲望，进而达到改变世界的效果。如他所说，“历史现实当然总在被符号化；我们对历史现实的体验总是以不同的符号化模式来调停的”（齐泽克，2017，p. 137），世界总在被语言符号改变，人改变世界的体验也是以语言符号为中介的。

与齐泽克从意识形态开始不同，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直接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开始，深入阐发具有自主性的语言何以改变世界。如果说齐泽克所构建的语言哲学体系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建构起的语言-欲望-世界，那么科拉科夫斯基则是在对苏联僵化体制的批判中建立起语言-权力-世界，其中政治意味取代了精神分析意味。

科拉科夫斯基的语言哲学大厦从建构语言的自主性开始。在他看来，“个体和物种存在于物质本身，就像它们存在于词语中一样”（科拉科夫斯基，2013a，p. 52），事物不仅以物质的方式存在，还以语言的方式存在，语言与物质是处于相同地位的，而并非由物质决定、归属于物质之下的领域。对于语言的这种地位，科拉科夫斯基谈道，在现代社会，“词语变成了自主的”，“不再仅仅是交换的中介”，而是“实在的一个独立领域”，不再是“功能上”与一系列“传递”功能相关的东西。（2013b，p. 35）语言从附属的地位解放，因为语言不再作为为他者（for others）的存在，不再是单纯的中介，而是作为自为（for itself）的存在，获得了自身的自主性，这奠定了语言改变世界的存在论基础。

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具有自主性的语言成为“实在的共同生产者”，世界与语言“相互决定”，因为被追问的对象“已经被提供了意义”，“世界只能以语言的形式被占有”（科拉科夫斯基，2013b，p. 37）。自主的语言本身就决定着世界，无论人之意图为何，语言总是以有意或无意的方式产生以言取效结果。<sup>①</sup> 这意味着当人考察世界、改造世界之时，语言已经在场，世

---

<sup>①</sup> “To be sure, the speaker does not necessarily intend to produce every perlocutionary effect her utterance turns out to have.”（Kissine, 2008, p. 1192）

界逃不出语言，要改变世界必然要求语言作为前提条件，要求掌握语言。因此，他说语言具有无限的“创造性”和“破坏性”，语言能够“颠倒、隐藏或损害”事实。（pp. 37 - 38）于是，语言被所谓的“知识分子”利用，他们“操纵词语”，从而取得“加强和改善他们的特权地位”的效果。（p. 36）因为语言不再仅仅是沟通的中介，它自获得自主性开始，就从“沟通”转向“改变”，以自身特有的方式产生效果、改变世界，所以，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便利用语言巩固政治权力，“改变”即是“加强”权力和“改善”地位。这种具有无限潜力的语言，被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通过“占有”语言，将语言置于权力之下，实现语言垄断，从而发挥其无限能力，来掌握并改变世界。语言就这样成为权力 - 世界背后之根本因素。

以齐泽克和科拉科夫斯基为代表的东欧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其独特的语言哲学视角，聚焦人的社会性，既从语言改变世界的中介性出发，又从语言改变世界的自主性出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观点。齐泽克以批判的方式，从语言符号化的视角出发，以意识形态 - 语言 - 社会存在为地基，建构并阐发语言 - 欲望 - 世界的语言 - 精神分析路径；科拉科夫斯基则从语言的自主性切入，构筑起语言 - 权力 - 世界的语言 - 政治学路径。二者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回答了语言与改变世界的关系，厘清了语言的以言取效力量，开辟了社会语言理论，为“改变世界”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走向语言斗争、语言革命提供了范式基础。

总的来说，东欧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立足人的现实性、历史性与社会性，从语言与人的生存状况入手，在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关于语言论述的三个层面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命题，为“现实的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改变世界”赋予了语言的内涵。这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推动了语言哲学与现实存在的接轨，促进了语言哲学与语言学对实际现象的关注，既让言语行为理论具有马克思主义内涵，又让马克思主义拥有语言学与语言哲学意蕴。在人的现实性方面，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关注语言 - 交往问题，根据语言的以言行事力量考察现实的语言交往活动，建立交往语言理论；在人的历史性方面，则注重语言 - 存在问题，以语言的以言表意力量剖析历史的语言实践活动，构造实践语言理论；在人的社会性方面，聚焦语言 - 政治问题，以语言的以言取效力量把握社会的语言政治行动，即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等，筑建社会语言理论。东欧马克思主义的交往语言理论、实践语言理论、社会语言理论具有丰富深刻的意蕴，独具特色，不仅对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更为西方带有形而上学传统的语言哲学的发展提供了

## □ 符号与传媒 (25)

马克思主义道路。

### 引用文献：

- 蔡曙山 (2006). 再论哲学的语言转向及其意义——兼论从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的发展. 学术界, 4, 20-39.
- 陈嘉映 (2003). 语言哲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傅其林 (2015). 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交往符号学思想. 学术交流, 8, 16-23.
- 傅其林 (2020). 论东欧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核心命题.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53 (1), 63-72.
- 关巍 (2019). 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批判的基本理论建树. 学术交流, 10, 37-44.
- 海德格尔, 马丁 (2014). 路标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赫勒, 阿格妮丝 (2010). 日常生活 (衣俊卿, 译).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 赫勒, 阿格妮丝 (2012). 现代性能够幸存吗? (王秀敏, 译).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 赫勒, 阿格妮丝 (2015a). 一般伦理学 (孔明安, 马新晶, 译).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 赫勒, 阿格妮丝 (2015b). 道德哲学 (王秀敏, 译).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 赫勒, 阿格妮丝 (2015c). 碎片化的历史哲学 (赵海峰, 高来源, 范为, 译).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 科拉科夫斯基, 莱泽克 (2013a). 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当代左派的文集 (姜海波, 译).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 科拉科夫斯基, 莱泽克 (2013b). 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 (李志江, 译).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 蓝江 (2013). 语言哲学下的生命政治——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语言转向. 哲学动态, 1 (2), 38-47.
- 马尔科维奇, 米哈伊洛 (编) (2010). 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 (郑一明, 曲跃厚, 译).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 (19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 (196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一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齐泽克, 斯拉沃热 (2002). 图绘意识形态 (方杰,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齐泽克, 斯拉沃热 (20017).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季广茂,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沙夫, 亚当 (1979). 语义学引论 (罗兰, 周易,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维特根斯坦 (2003). 维特根斯坦全集 (第八卷) (涂纪亮,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 俞吾金 (2003). 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语言学转向. 河北学刊, 6, 41 - 45, 63.
- 袁文彬 (2007).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 11 - 15.
- 张一兵 (2012).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 (下卷).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Austin, 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Thomas McCarthy, 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
- Kissine, M. (2008). Locutionary, Illocutionary, Perlocutionary. *Language & Linguistics Compass*, 2 (6) 1189 - 1202.
- Skolimowski, H. (1965). Analytical-Linguistic Marxism in Polan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 235 - 258.
- Stiles, W. B. (1981). Classification of Intersubjective Illocutionary Acts. *Language in Society*, 2, 227 - 249.

**作者简介:**

邵帅, 四川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Author:**

Shao Shuai, Ph. D. candidate of Philosophy Department, Sichua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ield is Marxist philosophy.

Email: 243332464@qq.com